



文天祥《集杜詩》探析

姚吉聰

文天祥（1236-1282），初名雲孫，字天祥，一字宋瑞，號文山，吉水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宋理宗寶祐四年（1256）狀元及第。理宗開慶元年（1259），元軍壓境，宦官董宋臣主張遷都四明，滿朝文武怯其勢力不敢異議，唯文氏上奏乞斬董宋臣，以安社稷。未果，自請罷官；咸淳六年（1270），除軍器監，忤賈似道，復罷官歸里。九年，除湖南提刑，差知贛州。德祐元年（1275），應詔勤王，組織義軍，入衛臨安，復遭忌出知平江府。二年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出使元營談判，見扣，歷盡艱險得脫，後由海路南下，於福建抗元。景炎二年，進兵江西，帝昀即位，授少保、信國公。最後在廣東海豐北方五坡嶺被俘，北送大都，於獄中幽囚數年，威逼利誘之下，始終不屈。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十二月初九日，就義於柴市。¹

文天祥身逢亂世，兵馬倥傯之際，仍不忘以詩存史，庶使後人不忘南宋末年之巨變與史實，創作不斷，為後世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。本文則以其幽繫大都時所作《集杜詩》二百首為對象，探討文天祥其人其詩，受杜甫詩影響的各個層面，來一探詩人之用心、志士之情懷與忠臣的悲壯。

一、文天祥與杜詩

每個人的文學創作與理念，不可避免的會受時代風氣與文學思潮的影響。文天祥生於宋末，對於與宋代詩歌關係密切的杜詩自然深有感悟，再加上他特殊的經歷與遭遇，成為兩宋詩人中，學杜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要角。以下試從宋詩對杜甫詩的接受，及文天祥自己的自覺來一探文氏及杜詩的歷史淵源及其用心。

（一）、宋詩對杜甫詩的接受

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，唐詩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，在唐詩光環的

¹鄭曉瓊，《論文天祥的詩歌藝術》，（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，頁1。



籠罩之下，宋初詩人顯得進退失據，蔣士銓所謂「宋人生唐後，開闢真為難」，可謂一語中的，摹仿和沿襲成了無奈的選擇。白體、晚唐體、西崑體的盛行，雖如此，卻也顯現出在文化上承傳著中唐以來的新變精神。這些被摹仿的對象，無不受杜詩的重大影響，亦可謂皆出於杜。一旦取法乎上，學杜將是必然的歸宿，而宋初詩風的或平易、或淡樸、或雕琢，也為宋調的出現和宋人對杜詩的重新詮釋與接受奠定了基礎。

宋初的王禹偁不僅學杜甫的古體長篇；且學杜詩的凝練含蓄，以修正白體的直率淺露；還繼承了老杜「憂黎元」的社會關懷精神。慶曆、嘉祐時，梅堯臣、歐陽脩、蘇舜欽、范仲淹等以強烈的自力意識，初步創作了有別於前代的「宋調」。而美刺創作觀念的復興和以文為詩的初步發展，可謂此時期詩人學杜最突出的成就。

隨著時代的遷移，革新形勢的造就，杜詩從「蓋不為近世所尚，墜逸過半」，到「近世學者，爭言杜詩」其間不過二十餘年，影響層面迅速擴大，宋詩從此進入以王安石、蘇軾、黃庭堅等人為代表的創新階段。雖然此三人的詩風差異頗大，然有共同的依歸，陳師道云：

詩欲其好，則不能好矣。王介父以工，蘇子瞻以新，黃魯直以奇。
而子美之詩，奇常、工易、新陳，莫不好也。²

可見三家風格雖異，都包涵在杜甫的博大、渾成之中。

三家之於杜，都推崇杜甫的道德人格，都深刻認識、學習杜詩的藝術造詣：關心民瘼的題材、題畫詩、論詩詩等的創作；以文入詩、以議論入詩；多用典、重煉字；好翻案為文以及拗體律詩和絕句的摹擬等。後人學王安石詩較少，而蘇、黃詩風幾乎籠罩整個詩壇。其中黃庭堅所開江西一派，著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，與後起者陳師道、陳與義，並稱為「三宗」，遙接杜甫之「一祖」。杜詩風靡天下，可見一斑。

雖然江西詩派末流多採取「資書以為詩」的辦法，在押韻、用字、使典上下功夫，逐漸走上形式主義的道路，但也曾努力進行自救。陳與義等人親經喪亂，開始注意擴大詩的題材，著重描寫國難中的經歷及抒發個人的憂憤、抑鬱之情。呂本中更針對時人作詩的拗折與艱澀，提出

² 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集部/詩文評類/後山詩話，葉5。



「活法」說；曾幾贊同呂氏主張，作詩輕快流動、清新活潑。呂、曾詩皆師杜，但他們更注重學習杜詩的「無比出清新」，在與江西詩人一脈相承之外，又有新的發展。二人是江西詩風轉折的關鍵，也是宋調由成形、凝定轉向變異的重要開端。

南宋有所謂「中興四大詩人」：陸游、范成大、楊萬里、尤袤，從淵源上看，陸、范、楊等人的詩歌創作皆脫胎於江西詩派。從識其弊端到漸漸超越，從對立的角度認識江西詩學；而且對其始祖杜甫的忠君愛國有更深入的認識。當時國家受異族侵凌，北伐呼聲高漲，在這種時代氛圍下，詩人們創作了大量愛國詩作。

四大詩人之後，大多數詩人都力求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。「四靈」、「江湖派」相繼以反對的姿態登場，他們拋棄了宋調以議論、文字、典故等為詩，但並未丟棄技巧，只是方法與江西詩派略有不同，氣魄更加狹小、題材也更狹窄、意境也過於清寒單調。不過江湖詩人對杜詩深廣的愛國情操和傑出的藝術創造能力，是給予高度評價的，雖難企及杜詩之境界，卻在南宋末期詩人身上，看見了杜甫沉鬱悲壯的實質精神。

江湖諸人既沒，繼者為晚宋詩體。晚宋諸人，皆生當宋季，卒於元初，目睹邦家傾危，君后北遷，生民塗炭，將吏死節，而興懷忠耿之情，慘恫悲憤之意交錯胸中。發以為聲，筆以為詩，其韻調風格，乃不約而同趨一體；所謂亂世之音怨以怒，亡國之音哀以思也。³

綜觀兩宋，隨著政治改革的逐步推形，杜甫作為道德和藝術的雙重典範，在慶曆後被大力推舉。之後，綿延二百年的江西詩派成為宋調典型，杜甫也成宋調的不祧之祖。而隨著江西末流之衰敝，中興詩人、四靈、江湖詩派等以學晚唐而力矯其弊，宋調出現了反播和變異，但諸人的推尊晚唐只是要達到學杜的一個環節，杜詩的精神和藝術仍是其追尋的最終目標。宋末，遺民詩人的悲壯之音為宋人學杜畫上重重的尾聲。由此可知，宋調的形成、發展和變異的歷史，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對杜甫或親近或疏離，從不同角度進行接受和學習的歷史。⁴

³梁昆，《宋詩派別論》，（臺北：東昇出版社，1980/5），134。

⁴梁桂芳，《杜甫與宋代文化》，（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5/4/3），頁 89-97。



(二)、文天祥與杜詩

文天祥一生都非常崇拜杜甫，在他生命的後期，更是再現實主義、愛國主義的結合上與杜甫產生了強烈的共鳴。這時，他的身世經歷與杜甫十分相似：兩人都遭逢亂世、為國為民焦慮擔憂、四處顛沛流離而心懷節義忠烈。⁵

文天祥今存詩歌八百多首，學術界一般以他於宋恭帝德祐元年（1275），起兵勤王為界線，將其詩歌分為前後兩期。前期詩歌（二百四十多首）多為酬唱、贈答之作，較無深刻意涵，詩風受到江湖派的影響。後期，由於國勢發生急遽變化，詩人的生活內容也隨之改變，他目睹社稷傾危、民族急難，憂心如焚，乃投入抗元行動。經歷了出使元營、萬里逃亡、聚師抵抗、兵敗被俘、燕京囚獄等一連串艱苦考驗與磨練，詩風明顯受到杜甫影響。所作《指南錄》、《指南後錄》、《吟嘯集》、《集杜詩》，風格淒楚蒼涼，慷慨悲壯。

1、文天祥的前期詩歌

文天祥的前期詩歌雖受江湖派影響較多，但其喜愛杜詩卻是由來已久。他前期詩作〈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〉云：

杜詩舊本，病於篇章之雜出；諸家註釋，人為異同。淦北山子曾季輔，平生嗜好，於少陵最篤。編其詩，仿文選體：歌行律絕，各為一門，而紛紛註釋，自以意為去取。意之所合，列於本文下方，如東萊詩記例。而總目之曰《少陵句外》。予受而讀其凡，蓋甚愛之。既錄其副，則復慨然曰：世人為書，務出新說，以不蹈襲為高；然天下之能言眾矣，出乎千載之上，生乎百世之下，至理則止矣。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，凡為吾用，皆吾物也。是意也，東萊意也，而北山子得之。觀舞劍而悟字法，因解牛而知養生，予也受教於北山子矣。⁶

對於杜詩之版本、註釋的時況有相當了解，且對曾季輔所作《少陵句外》

⁵趙冰潔，《文天祥對杜甫詩歌的繼承》，（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，頁1。

⁶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227。



的體制、註釋的裁擇給予肯定，並抄錄一副本。可見他喜愛、熟悉杜詩之一斑。

另外，〈生日和聶吉甫〉云

……細味詩工部，閑評字率更。……⁷

對杜甫詩仔細涵泳，於歐陽詢書法游藝品評。生活樂事，於是乎在。

另外如〈題梅尉詩軸〉、〈題彭小林詩稿 其父號雅林〉、〈挽龔用和〉云：

憂國杜少陵，感興陳子昂。⁸

晚識宗文憶浣花，刪餘今見雅名家。⁹

鄜州避亂杜工部，下澤乘車馬少游。¹⁰

將他所看重的同時代人物喻為杜甫；把彭雅林父子喻為杜甫父子。直將杜甫作為人格與藝事的典範。

再如〈再用前韻〉、〈送人往湖南〉曰：

未說離懷向南浦，須知詩意在夔州。¹¹

雲隔酒尊橫北海，風吹詩史落西川。¹²

在詩中屢屢提及杜甫其人、其詩，時時流露喜愛、欽敬、學習之意。如果不是受杜甫的人格感召、對杜集的手不釋卷，是不會有如此的不經意的詩作表現的。

2、文天祥的後期詩歌

杜甫在詩歌中表現了強烈的忠君意識，也抒發了他的政治理想，充滿了先秦儒家的人文精神。抱持著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，雖然飽受生活的折磨，但未迴避艱苦，依然面對現實與人生。

⁷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23。

⁸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12。

⁹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12。

¹⁰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0。

¹¹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21。

¹²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24。



而文天祥的忠君愛國，除了理學大環境的薰染外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理由——宋理宗對他的知遇之恩。文天祥 21 歲狀元及第，帝（理宗）「親擢為第一」，《寶祐四年登科錄》中錄有一首皇上親題的〈賜狀元文天祥已下詩〉，詩曰：

道久於心化未成，樂聞爾士對延英。誠惟不息斯文者，
治其多端在力行。華國以文由造理，事君務實勿沽名。
得賢功用真無敵，能為皇家立太平。

皇帝親自表達了對文天祥的肯定，更多的是對他以後治國平天下，實行而勿浮華的期許。如此的期望，感激之餘，文氏以〈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書〉作答曰：

於皇王子自乘龍，三十三年此道中。悠遠直參天地化，
昇平奚羨帝王功。但堅聖志持常久，須使生民見泰通。
第一臚傳新渥重，報恩惟有厲清忠。¹³

第一臚傳，知君深遇，唯有清操自勵，忠貞自期。所謂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信念，使他不但力戰到最後，即使受盡各種磨難，也不動搖。他的辛苦、光榮與悲歡，都是狀元及第帶來的。〈過零丁洋〉詩云：

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落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飄絮，
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裡歎零丁。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¹⁴

這一經之起，緊接著是忠言直諫，一往無前的為國奉獻。與當年杜甫獻〈三大禮賦〉而得唐玄宗賞識，以至幾十年後仍回憶起開元盛世，如〈憶昔〉之二言：

¹³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1。

¹⁴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49。



憶昔開元全盛日，小邑猶藏萬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
公私倉廩俱豐實。九州道路無豺虎，遠行不勞吉日出。
齊紈魯縞車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宮中聖人奏雲門，
天下朋友皆膠漆。百年餘間未災變，叔孫禮樂蕭何律。¹⁵

那是杜甫的理想時代、聖明之君；而宋理宗在文天祥心目中未嘗不是如此。雖然理宗治國日非，度宗權柄為賈似道所竊，奔波流離亦不辭勞苦；國破家亡仍舊要「化作鶻啼帶血歸」。杜甫與文天祥可謂隔代知音，相互輝映。

從德祐元年到至元十九年，是文天祥幾乎無時無刻面對生死關頭的七年。他在《指南錄·後序》中記之甚詳：

嗚呼，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：詆大酋當死；罵逆臣當死；與貴酋處二十日，爭曲直，屢當死；去京口，携匕首以備不測，自剄死；經北艦十餘里，為巡船所物色，從魚腹死；真州逐之城門外，徬徨死；如揚州，過瓜州楊子橋，竟使遇哨，無不死；揚州城下，進退不由，殆例送死；坐桂公塘土圍中，騎數千過其門，落賊手死；賈家庄，為巡徼所陵迫死；夜趨高郵，迷失道，陷死；質明，避哨竹林中，邏者數十騎，無所逃死；至高郵，制府檄下，以捕繫死；行城子河，出入亂屍中，舟與哨相後先，邂逅死；至海陵，如高沙，常恐無辜死；道海安如皋，凡三百里，北與寇往來其間，無日而非可死；至通州，以不納死；以小舟涉鯨波，出無可奈何，而死固付之度外矣。嗚呼，死生晝夜事也，死而死矣，而境界危惡，層見錯出，非人世所堪。痛定思痛，痛何如哉。¹⁶

身臨死境，又僥倖得脫凡十八次，只有冰雪清操自堅如文天祥者，方能在先後六次罷官貶職；抗元過程中，除江西戰場小有勝利外，餘皆屢敗屢戰，終至被俘；又親見南宋小朝廷覆滅的痛不欲生中，俯仰無愧。如

¹⁵仇兆鰲，《杜詩詳注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/10），頁 1163。

¹⁶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12-313。



其〈衣帶讚〉所言：

孔曰成仁，孟云取義。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

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¹⁷

所經所歷，與杜甫相似而過之，成仁取義，只能說鬼神泣壯烈。他繼承、發揚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，以憂慮的心情、悲嘆的語調抒寫對國家命運的關注；反映人民疾苦，抒發對人民深切的同情。他追攀杜甫「詩史」的筆法，以詩的形式，選取最典型的形象和事件，來反映或表現歷史生活的真實面貌，和詩人敏銳感受到的時代氛圍，在揭示社會的本來面目和心理狀態的同時，從更高的層次上把握歷史精神。¹⁸

杜甫和文天祥的詩作被稱作「詩史」，主要體現在他們的紀行詩中。杜甫的〈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〉、〈北征〉，自秦州赴同谷、自同谷赴成都的各十二首紀行組詩，把個人身世的喟嘆與人民的流離、國家的興衰緊密結合起來；文天祥後期有兩次長途跋涉，一次是德祐二年（1276）的南下，一次是至元十六年（1279）的北上。兩次長征留下紀行詩 170 多首，佔文氏後期詩的三分之一，另外《集杜詩》中也有部分紀行詩。

文天祥的南下紀行詩乃因赴元營談判見拘，且被迫為祈請使詣北，至京口時，脫逃南歸所作，主要記敘自己鎮江脫險和投奔流亡政府的經歷。歷時四月餘，跋涉數千里，以七絕組詩賦筆直書，共 35 題 95 首，均收錄在《指南錄》裡。用七絕組詩敘寫時事，是杜甫對詩體的一種發展，但他的紀行詩都是五古、五律，而文天祥受其影響又有所發展。

北上紀行詩係五坡嶺兵敗被執，由張弘範派兵由廣州押送往大都期間所作。歷時五月，途經六省，行程更長，共 69 題 77 首，收錄在《指南後錄》中。多五律、五古。這些五律既是紀行詩，又是詠懷詩，寫景簡潔，語言也平實自然，而感情則沉鬱激烈，與杜甫晚年湖南紀行詩中的五律頗為一致。無論是故土親人之思、景物風俗之繪、憶昔懷舊之什、弔古詠史之作，都飽含著江山易主的悲憤之痛，又昇華為忠貞不屈、守

¹⁷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465。

¹⁸趙冰潔，《文天祥對杜甫詩歌的繼承》，（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，頁 18-25。



節不移的決心。亡國恨、殉國志，是貫串文天祥北上紀行詩的主旋律。¹⁹文天祥以其自身獨特的生命經驗，在宋詩尊杜的大潮中，有繼承也有相當的開拓。他一生喜愛杜詩，受其薰染。在此，可以用其〈讀杜詩〉作為他的自剖：

平生蹤跡只奔波，偏是文章被折磨。耳想杜鵑心事苦，
眼看胡馬淚痕多。千年夔峽有詩在，一夜采江如酒何。
黃土一丘隨處是，故鄉歸骨任蹉跎。²⁰

雖然寫的是杜甫的飽經戰亂、顛沛流離的遭遇和憂國傷時的心情，即使客死他鄉，但他總是留下留傳千古的詩作。其實不也是後世的我們眼中的文天祥。而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言曰：

天祥平生大節，照耀今古，而著作亦極雄贍，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。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，持論剴直，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。故長谷真逸農田餘話曰：宋南渡後，文體破碎，詩體卑弱，惟范石湖、陸放翁為平正。

至晦庵諸子，始欲一變時習，模仿古作，故有神頭鬼面之論。時人漸染既久，莫之或改。及文天祥留意杜詩，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，觀指南前後錄可見。不獨忠義貫於一時，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。²¹

除了對文天祥的忠肝義膽稱許有加，更點出文天祥對杜詩的接受，故所作不同凡陋。也是對文天祥詩的精確概括。

二、文天祥《集杜詩》探析

至元十七年（庚辰，1280）正月，文天祥集杜甫五言詩為絕句，至二月，得絕句二百首，其中 105 首有序。十月，又集杜句得〈胡笳曲〉十八首。這些詩篇是對歷史的回顧和總結，有懷舊思鄉之情，也有對世道人心的感嘆。藉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，首首真切自然，真摯感

¹⁹趙冰潔，《文天祥對杜甫詩歌的繼承》，（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，頁 25-30。

²⁰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78。

²¹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總目/卷 164，葉 25-26。



人。《集杜詩》作為他一生經歷的回顧，再現了南宋末年的歷史，內容詳實可靠，成為最有價值的史料。²²以下先就集句詩之歷史略作探究，然後直指文天祥《集杜詩》的內涵探索。

(一)、集句詩的歷史與特色

關於集句詩的歷史與特色，明代徐師曾概要的說：

按集句詩者，雜集古句以成詩也。自晉以來有之，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。蓋必博學強識，融會貫通，如出一手，然後為工。若牽合傅會，意不相貫，則不足以語此矣。²³

始於晉，發展於宋；其特色與難處在於若無博聞強記，融會貫通，渾然無跡，則意不相貫，淪於牽強湊合。

王安石特擅此道，現存其集句詩達六十餘首，最著名的集句組詩〈胡笳十八拍〉確立了集句在宋代詩壇的地位。《夢溪筆談》這樣說：

荆公始為集句詩，多者至百韻，皆集合前人之句，語意對偶，往往親切過於本詩，後人稍稍有倣而為之者。²⁴

集他人句而能對偶親切，即使偶然興會，更顯難能。何以至此，誦古人詩多也。元初牟巘說：

(集句)實始於半山王公，半山平生崛強執拗，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，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為斷爛朝報，然乃甘摭拾陳言，從事集句，何耶？然其天資殊絕，學力至到，猝然之間，不勞思惟，立成數十韻，對偶親切，吻合自然，亦難矣。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，尤喜集句，合異為同，易故為新，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。前後凡若干首，題曰唐宋百衲集、唐宋集古樂府，皆在焉。²⁵

²² 鄭曉瓊，《論文天祥的詩歌藝術》，(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/5)，頁 18。

²³ 明·吳訥、徐師曾、陳懋仁，《文體序說三種》，(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8/6)，頁 63。

²⁴ 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子部/雜家類/雜說之屬/夢溪筆談/卷十四，葉 7。

²⁵ 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集部/別集類/南宋建炎至德祐/牟氏陵陽集/卷十二，葉 15。



王安石推行新政，干犯眾怒，然才思學力敏捷、深厚如此，可想像其席間風采。而學之者浸多矣。另外，有孔平仲為集句名家，竹坡詩話云：

孔毅父喜集句，東坡嘗以「指呼市人如使兒」戲之。觀其〈寄孫元忠〉詩云：『不恨我衰子貴時，經濟實藉英雄姿。君有長才不貧賤，莫令斬斷青雲梯。驂騮作駒已汗血，坐看千里當霜啼。省郎京君必俯拾，軍符侯印取豈遲。』殆不減〈胡笳十八拍〉也。¹²

〈寄孫元忠〉乃組詩，多達 31 首，俱為集杜句，開後來文天祥集杜之先。至南宋，集句蔚然成風，文天祥《集杜詩》是其典型。

(二)、文天祥《集杜詩》探析

1、文天祥《集杜詩》的創作背景

四庫全書《文信公集杜詩》提要云：

文信公集杜詩四卷，一名文山詩史，宋文天祥撰。蓋被執赴燕後，于獄中所作。詩凡二百篇，皆五言二韻，專集杜句而成。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，而題下敘次時事，於國家淪喪之由、生平閱歷之境，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，一一詳誌其實，顛末粲然，不愧詩史之目。吳之振宋詩選徒以裁割巧言評之，其所見抑亦未矣。²⁶

以這種「每篇之首，悉有標目次第，而題下敘次時事」的方式，達到「於國家淪喪之由，生平閱歷之境，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，一一詳志其實。顛末粲然，不愧詩史之目。」的效果。

文天祥在大都獄中，艱難條件之下，是如何讓自己有述作的動力，是怎樣的心境呢？試看其《集杜詩》自序：

余坐幽燕獄中，無所為，誦杜詩，稍習諸所感興，因其五言集為絕句，久之，得二百首。凡吾意所欲言者，子美先為代言之，日玩之不置，但覺為吾詩，忘其為子美詩也。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，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，煩子美道耳。子美於吾隔數百年，而其言

²⁶ 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集部/別集類/南宋建炎至德祐/文信國集杜詩/提要，葉，1-2。



語為吾用，非情性同哉。昔人評杜詩為詩史，蓋其以詠歌之辭，寓紀載之實，而抑揚褒貶之意，燦然於其中，雖謂之史可也。予所集杜詩，自予顛沛以來，世變人事，槩見於此矣。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，後之良史，尚庶幾有考焉。²⁷

序中他和盤托出自己集杜詩的本來緣由和奇妙感受的同時，也隱約表露了比附少陵「詩史」之心。他一生極其崇拜杜甫，這和兩宋對杜甫的普遍尊仰固有關係，但他個人還有一層更親切的特殊理由，便是身世經歷的相似：世事劇變，社稷崩壞、顛沛流離的相似；懷瑾握瑜，節義凜冽，亟思報效又相似。²⁸

文天祥自認他的「情性」與杜甫的相同，故爾他之「所欲言者，子美先為代言之。」而他又能用子美的現成詩句來宣示他的「情性」，因此媒介，他與隔了數百年的杜甫在詩歌的領域合而為一了。這不能不說事他的詩性情的一個大擴展，之前他在〈跋周汝明自鳴集〉中說：

天下之鳴多矣，鏘鏘鳳鳴、雝雝鴈鳴、喈喈雞鳴、嘒嘒蟬鳴、呦呦鹿鳴、蕭蕭馬鳴，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為，各一其性也。其於詩亦然。鮑謝自鮑謝；李杜自李杜；歐蘇自歐蘇；陳黃自陳黃，鮑謝之不能為李杜，猶歐蘇之不能為陳黃也。吾鄉周君性初善為詩，署其集曰自鳴。予讀之，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。予亦好吟者，然予能為予之言，使予彷彿性初，一語不可得也。予以予鳴，性初以性初鳴，此之謂自鳴。雖然凡音生於人心，其所以鳴則固同矣。²⁹

從「各一其性」、「自鳴」的絕不混同，到集杜詩卻和杜甫「共鳴」起來，兩人「情性」竟合而為一。不但兩人的鳴聲相彷彿，文天祥自己也在不覺中把杜甫的詩渾然的當成自己的詩了：「凡吾意所欲言者，子美先為代言之，日玩之不置，但覺為吾詩，忘其為子美詩也。」正是他後其詩歌成就非凡而直接接續杜甫高度的成果。

²⁷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97。

²⁸胡明，《南宋詩人論》，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0/6），頁 340。

²⁹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245。



2、文天祥《集杜詩》探析

《集杜詩》自〈社稷第一〉起，到〈(歎世道)第二百〉止，不僅把詩和史，而且把記事、論說、抒情融為一體。是一部用血淚和鬥志寫就的文天祥《文山詩史》。

《集杜詩》二百首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部分：第一部分從〈社稷第一〉到〈陸樞密秀夫第五十二〉，寫南宋敗亡的世變人事，起自宋理宗末年賈似道擅政專權，景定元年瀘州叛，咸淳九年襄陽陷，咸淳十年鄂州降，德祐元年魯港敗，以及鎮江之戰，三山擁立，景炎賓天，祥興登極，崖山覆滅等重大事件和有關人物。第二部分從〈勤王第五十三〉到〈入獄第一百四〉，寫自己起兵贛州、入衛臨安到兵敗海豐、囚居大都的經歷。第三部分從〈懷舊第一百五〉到〈次妹第一百五十五〉，是紀念自己的部將、戰友和親人。第四部分是抒情詩，抒發「思故鄉懷故山之情」，並「雜然寫其本心」；「泛然為世道感歎」。這兩百首詩，是南宋末年天地傾覆、山河破碎、廟社淪亡的實況，又是作者扶顛持危、勤王抗元的自傳。以下分別就這四部分略作探論。

(1)、〈社稷第一〉到〈陸樞密秀夫第五十二〉

孟子言：「民為貴，君為輕，社稷次之」，人民苦難，貫串整個文天祥的後期詩歌；就國家而言，《集杜詩》首列〈社稷第一〉，再列〈理宗度宗第二〉，良有以也。試看第一首：

〈社稷第一〉三百年宗廟社稷，為賈似道一人所破壞，哀哉。

南極連銅柱 送李晉肅 煌煌太宗業 北征 始謀誰其問 舟中苦熱
風雨秋一葉 李光弼³⁰

序言直指賈似道徒然權傾天下，但毫無作為，甚至開邊起釁，三百年國家，毀於一人之手。詩中委婉藉杜甫之口，言國家似風雨中的一葉，而首輔之臣不思盡忠，導致偉大的太宗建國大業，竟至萎落。詩、序結合緊密，相輔相成。以敘事詳明言，則「序」堪此任；以委婉諷諫而言，則「詩」得其所。《集杜詩》中各詩往往如此。另外各句接標出處，對於追索原詩，尋究寓意，給後人極大方便。如〈誤國權臣第三〉：

³⁰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97。



似道喪邦之政，不一而足，其羈敵使、開邊釁，則兵連禍結之始也，哀哉。蒼生倚大臣 送韋中丞 北風破南極 北風 開邊一何多 前出塞 至死難塞責 吳侍御江上宅³¹

杜甫的原詩是用來抨擊李林甫、楊國忠等權臣喪邦誤國，釀成安史之亂以至滿朝殺氣、胡騎縱橫，錦繡河山遭踐踏，無辜百姓流離失所，表現了無比的憤慨；文天祥集句為詩，譴責賈似道等禍國殃民的行徑，遠過李、楊之行。和第一首配合起來看，更顯完整與沉痛。

從〈瀘州大將第四〉到〈京湖兩淮第二十七〉依序寫元軍的勢如破竹，而朝廷養兵百萬，至此一無作用，望風而降者不勝數；有心報國者橫遭掣肘，以至不得不降；召張世傑至，而配合援軍不發，而海舟無風不能動，天時不予；以至將相棄國，江陵名將高達有功而未賞，降；揚州李廷芝畏怯而逃，下屬以城獻虜。國勢陵夷而上下猜忌，哀嘆之餘，亦已焉哉。

〈景炎擁立第二十八〉以下四首，寫益王登基至賓天，其中張世傑治海船，於福安府聞警即浮海南去，哀嘆天下事不可復為矣。

〈祥興登極第三十二〉寫衛王登極於硯川。三十三至三十九敘祥興行朝，張士傑安於厓山之形勝，然不知合變，以致覆亡。

第四十首起敘論可稱忠義之人物：陳宜中、張士傑、蘇劉義、魯淵子、江萬里、趙倅昂、王安節、李芾、李庭芝、姜才、張珩、陸秀夫等，末世忠臣，不論功過而表彰之，為民族之大節存一實錄。

(2)、〈勤王第五十三〉到〈入獄第一百四〉

〈勤王第五十三〉到〈同府之敗第七十三〉是文天祥應詔勤王到兵敗被俘的過程。從被排拒、拜相、出使、被俘逃亡、自淮歸浙江、至福安、出兵江西，最後被執。歷歷在目的奮進、週旋，獄中思來，平淡視之矣。

〈行府之敗第七十四〉到〈入獄第一百四〉寫被執後，被帶往厓山，目睹厓山之敗，痛苦酷罰，無以勝堪而求死不得之境，繼而押解北上，至燕城，入獄，領赴北庭引問，不跪而抗詞不屈以待死的歷程。如〈江行第八十八〉：

³¹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98。



連山暗烽燧 送從弟亞 川谷血橫流 送樊侍御 揮淚臨大江 送
韋諷 上有行雲愁 遣興³²

杜甫真實記錄安史之亂中的慘狀，文天祥則以其詩句烘托出鬱結難解的悲傷。

(3)、〈懷舊第一百五〉到〈次妹第一百五十五〉

〈懷舊第一百五〉起有五首，「皆懷念故人爲王室而沒者，固多而不能盡記」；〈金應第一百一十〉起至〈陳督幹第一百二十五〉則爲知其名字，爲之作傳者。〈陳少卿第一百二十六〉到〈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〉，「皆師友之際，同列之情，死生契闊，不能自己也。」。〈墳墓第一百三十九〉到〈次妹第一百五十五〉，從回憶甲戌之春赴贛州省拜墳墓起，列敘宗族、母、舅、妻、女、兒、弟、妹等親人，國難之下，慘悽死難，一一歷數，真是情何以堪。如〈懷舊第一百八〉：

故人入我夢 夢李白 相視涕闌干 彭衙行 四海一塗炭 逃難 焉
用身獨完 垂老別³³

〈妻第一百四十三〉：

丁丑八月十七日，空坑之敗，夫人歐陽氏、女柳娘、環娘、子佛生，環之生母顏、佛之生母黃，並陷失尋。聞自隆興北行，惟佛生已死，人世禍難有如此者。

結髮為妻子 新婚別 倉皇避亂兵 破船 生離與死別 別賀蘭鋁
回首淚縱橫 示宗文宗武³⁴

杜甫原詩如實記錄了安史之亂的悲慘遭遇，四海塗炭，倉皇避亂，到處流亡，妻離子別，故舊失散而老淚縱橫，傷心不已。文天祥信手拈來，恰到好處，藉此表達元軍渡江南下所造成的國破家亡、妻離子散、故舊飄零的種種慘狀。文天祥與杜甫的遭遇是沒兩樣的，因而杜甫的詩境，早已融入其詩境之中。對故舊妻兒的深切懷念，躍然紙上。

³²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418。

³³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421-422。

³⁴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431。



(4)、〈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〉到〈歎世道第二百零〉

〈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〉到一百六十二，「皆思故鄉，懷故山之情。……故鄉萬里，並隔世外，惟死則魂歸吾故鄉耳。」；自第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九十一，共二十九首，「雜然寫其本心」〈歎世道第一百九十二〉至末了，則為「泛然為世道感歎」。³⁵ 如其〈第一百八十二〉

儒冠多誤身 贈韋左丞 識子用心苦 阮隱居 斯文憂患餘 宿鑿
石浦 鬱鬱流年度 雨³⁶

所用杜句，如其「辛苦遭逢起一經」一般，但是耿耿忠心，斯文不滅，雖知必死，無可奈何也無怨無悔。

文天祥的《集杜詩》不僅多方面繼承了杜甫詩，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所發展。《集杜詩》可以看作是一個大型組詩，它淵源於杜甫的組詩而擴大了好幾倍，從幾首、十幾首詩的連篇吟詠，到多達 200 首詩的鴻構巨製，無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。其中還有意識的寫了 45 個「人物列傳」，對於那些為國捐軀的部將幕僚，因此而留下資料。第三部分中所悼念的僚將賓從，大多在詩前小序裡寫明各自的姓名、字號、里籍、職務、生平主要事蹟，乃至性格特徵，即使是《宋史·忠義列傳》中同一人物的傳記也難出其右。同樣是詩史，杜甫對時事的描寫、歷史的反映，屬於一種藝術的概括；而《集杜詩》則是實錄，可以說杜側重在詩，而文側重於史。

文天祥另一組學杜、集杜的作品是〈胡笳曲〉十八首，模仿蔡琰〈胡笳十八拍〉，除了代蔡文姬立言，還融進了自己的經歷和情感，概括南宋末年的社會現實，抒發社稷傾覆、民族劫難的悲痛。透過對蔡文姬身逢戰亂、居胡思歸、別離二子等經歷的感同身受，可視之為文天祥自身的「悲憤詩」。

文天祥前期 259 首詩作中，僅有 9 首採用詩、序結合的形式。相較之下，後其 370 餘首詩中，有 174 首詩、序結合。再加上 218 首集杜詩中有 100 首也如此。以詩繫文，以文釋詩，詩、序互證互補，得之於杜甫多矣。

³⁵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397-441。

³⁶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，頁 438。



三、結論

文天祥處南宋末世，力挽狂瀾，誓死不屈。其飽經憂患，辛苦遭逢，更甚於杜。他的詩作，充分表現了像杜甫那樣的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，所著《指南錄》，皆奉使脫難興復紀事之作，康有為評梁啟超詩「豈愧詩史」，若移評文山，固更為允當。然而文天祥詩中與杜甫相似的遭遇及情感，卻往往是通過對杜詩形式的學習與模擬而達到成功的藝術表現。如其〈六歌〉之三，置於杜甫〈同谷七歌〉之中，幾無可辨。多麼形似而神似。「坐幽燕獄中」，集杜詩二百首，「世變人事，概見於此」，固為寄託自己的情懷，然如此大量集杜，「裁割鎔鑄，巧合自然」，正是對杜詩句律形式的銳意研習，亦無庸置疑。³⁷

文天祥的《集杜詩》不僅專集杜甫詩句，而且在詩體、題材、技巧、風格、愛國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諸方面對杜詩有所繼承和發展，吸收杜詩「詩史」的筆法；在集句方面的成就也可為空前絕後。藉杜甫之語，寫文天祥心中之事，從「自鳴」到與杜甫「共鳴」。哲人日已遠，典型照夙昔，我們展其書讀，古道盎然，英魂不滅，也算不負文天祥的一番用心了

參考書目：

- 仇兆鰲，《杜詩詳注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/10）
- 文天祥，《文文山全集》，（臺北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5/9）
- 朱小寧，《試論文天祥前後期詩風的變化》，（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5/5）
- 明·吳訥、徐師曾、陳懋仁，《文體序說三種》，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8/6）
- 胡明，《南宋詩人論》，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0/6）
- 梁昆，《宋詩派別論》，（臺北：東昇出版社，1980/5）
- 梁桂芳，《杜甫與宋代文化》，（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5/4/3）
- 許總，《杜詩學通論》，（臺北：聖環圖書公司，1997/2）
- 趙冰潔，《文天祥對杜甫詩歌的繼承》，（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
- 鄧碧清，《文天祥詩文》，（臺北：錦繡出版社，1993/1）
- 鄭曉瓊，《論文天祥的詩歌藝術》，（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7/5）

³⁷許總，《杜詩學通論》，（臺北：聖環圖書公司，1997/2），頁 34-35。